

# 一门新的语言学分支:复兴语言学

## ——兼谈濒危语言和濒危方言复兴的普遍制约条件和机制

(以) 诸葛漫 (中) 姚春林 著<sup>①</sup> 徐佳译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和研究范式——复兴语言学(*Revival Linguistics*)。希伯来语复兴历时120多年,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对已衰亡语言的复兴。相对而言,世界其他地区(如澳大利亚)的语言复兴运动仍处于起步阶段。毋庸置疑,在复兴某种语言的初期,语言专家必须长期观察、仔细倾听操这种语言的说话者的意愿,了解和界定这个特定的土著社群。只有这样,语言学家才能受到启发并协助语言复兴。希伯来语复兴的经验表明,语言复兴存在着语言学上的制约条件。一旦掌握了这些语言学上的制约条件,便能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濒危语言和方言,尤其对将来中国的濒危语言复兴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 复兴语言学 语言复兴 制约条件

### 一、引言

伴随着全球化、同质化、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文化殖民化,人类似乎要回到“巴别塔”之前的同语状态。越来越多的群体不幸加入“丧失传统的俱乐部”。由于一些群体力图恢复丢失的传统,语言复兴将变得非常重要。

出于种种原因,先前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复兴大半是失败的。从1992年开始,某些语言复兴项目(如Kaurua语)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并没有达到土著民的期望。其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后续)资金和专业人员,以及学校与社区语言项目融合不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如何成功开展语言复兴的认识和理论尚显不足。正如尼克·赛博格(Thieberger)所指出的那样,为语言维持项目设定期望目标的人往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他们认为应该在语言的代际传递中保留原来的语言结构成分,这样就为土著社群设置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值。<sup>②</sup>

在复兴濒危方言、少数民族语、土著语言和文化的过程中,可从相对成功的希伯来语的复兴运动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本文是复兴语言学(一门刚刚兴起的语言学分支学科)<sup>③</sup>领域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旨在从“当代希伯来语”(此后称为“以色列语”,迄今最成功复兴的休眠语言<sup>④</sup>)的复兴

<sup>①</sup> 诸葛漫(Ghil ʾad Zuckermann),剑桥大学、牛津大语言学双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东方学者211特聘教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语言学和濒危语言教授,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成员,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古尔班基(Gulbenkian)荣誉研究员。姚春林,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河北联合大学教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sup>②</sup> Thieberger, Nicholas Extinction in Whose Terms? Which Parts of a Language Constitute a Target for Language Maintenance Programmes? David Bradley and Maya Bradley (eds.),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 310-328.

<sup>③</sup> 详见 Ghil ʾad Zuckermann and Michael Walsh, “Stop, Revive, Survive: Lessons from the Hebrew Revival Applicable to the Reclamation, Maintenance and Empowerment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11(31), pp. 111-127.

<sup>④</sup> “以色列语”是本文第一作者使用的术语,详见 Ghil ʾad Zuckermann, Review Article of Nakdimon Shabbethay Doniach, and Ahuvia Kahane (eds.), *The Oxford English-Hebrew Dictiona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999(12), pp. 325-346.

运动中吸取宝贵的经验。

诸葛漫(Ghil 'ad Zuckermann)对以色列语的研究显示了语言中某些成分比其他成分更容易复兴。<sup>①</sup>比如,词和词形变化比语调、语篇、联想意义和内涵意义更易复兴。另外,语言复兴过程中应鼓励语言复兴者和土著领导人以现实的、而非纯语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语言复兴。例如,不能排斥复兴语言中的英语等外来词。从希伯来语的复兴中得出的结论将有助于澳大利亚的语言复兴者更有效地工作,敦促他们不要把时间、资源和精力浪费在那些不可能得到复兴的语言成分上。

语言复兴不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还有相当高的社会收益。它有助于土著民发展文化旅游业,促进社会和谐。人们经常看到,在语言复兴中,一些难于处理好正常社会关系的土著民变得通情达理、心态积极。

## 二、希伯来语复兴简介

希伯来语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4世纪,属闪米特语族西北语支迦南语的一个分支。公元132—135年,在朱迪亚(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爆发了反对罗马统治的巴尔-库克巴起义(Bar-Kokhba Revolt),此次起义的失败标志着口语希伯来语的灭亡。自此之后的1750年间,希伯来语“临床死亡”了。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礼拜和文学用语,它有时在犹太人聚居区内扮演着通用语的角色,但并不是他们的母语。

19世纪末,复活的希伯来语(现代以色列语)逐渐形成。这为语言学家研究语言起源、语言、身份和政治的关系,以及语言是否可以复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提供了实验条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希伯来语是截至目前最成功的复兴语言之一,但必须承认,现今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区所讲的语言在类型学和发生学上与《圣经希伯来文》(《圣经旧约》)或《密西拿》里所使用的希伯来语截然不同。

自以色列语形成伊始,学界对其发生学分类就存在不同意见。流行的传统观点认为,以色列语属闪米特语,是复活的希伯来语。与此相悖的观点认为,以色列语属于印欧语系,是依地语(Yiddish,又译“意第绪语”)的反映形式。也就是说,依地语是其“底层”,希伯来语为其提供了词汇,<sup>②</sup>是其“上层”。本文作者诸葛漫认为,以色列语不仅是多层的,也是多源的。作为一种闪米特-欧洲或欧亚混合语,以色列语既属于闪米特语(属亚非语系),又属于印欧语系。它建立在两大贡献语——“睡美人”般的希伯来语和“母语”依地语之上;同时,它又受到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先民所操持的其他语言的影响,如俄语、波兰语、阿拉伯语、拉地诺语(一种西班牙犹太人说的方言)、土耳其语、德语、法语和英语等。

<sup>①</sup> 详见 Ghil 'ad. Abba Zuckermann, "Why was Professor Higgins Trying to Teach Eliza to Speak Like Our Cleaning Lady: Mizrahim, Ashkenazim, prescriptivism and the Real Sounds of the Israeli Language", *Australian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05(19), pp. 210-231; Ghil 'ad Zuckermann, *Israelit safá yafá (Israeli - A Beautiful Language)*, Tel Aviv: Am Oved, 2008; Ghil 'ad Zuckermann, "Realistic Prescriptivism: The Academy of the Hebrew Language, its Campaign of 'Good Grammar' and Lexpionage, and the Native Israeli Speakers", *Israel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2008b (1), pp. 135-154; Ghil 'ad Zuckermann, "Hybridity versus Revivability: Multiple Causation, Forms and Patterns", *Journal of Language Contact*, Varia, 2009 (2), pp. 40-67; Ghil 'ad Zuckermann, "Do Israelis Understand the Hebrew Bible?", *The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 2010 (6); Ghil 'ad Zuckermann, "Hebrew Revivalists' Goals vis-à-vis the Emerging Israeli Language", in Joshua, A. Fishman & Ofelia García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Continu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II, 2011; 诸葛漫著、王晓梅译《混合还是复苏: 以色列语的起源——多来源、形式和模式》,载《南开语言学刊》2008(2): 23-35.

<sup>②</sup> Horvath, Julia and Wexler, Paul (eds.),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and Non-Creole Languages -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aitian Creole, Modern Hebrew, Romani, and Rumanian", *Mediterran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Monograph Series*, vol. xii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7.

希伯来语的复兴可以说成败参半。如果用1—10级(10表明完全成功,1表明完全失败)表示复活成功率:希伯来语的复兴位于第7级。其在语言学不同层面上的复活程度也不同,具体来说: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为一级(也就是欧化的);话语(交际工具,言语行为)一级;发音(语音学和音系学)二级;语义(意义、联想意义,内涵意义,语义网络)三级;构成成分/词序(句法学)四级;普通词汇五级;构词方式七级;动词的词形变化九级;基本词汇为十级(也就是希伯来语的)。

希伯来语复兴没能取得完全成功。其原因并非来自外部因素(如缺乏积极性、无法获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支持等),也不是因为语言复兴者[像以色列语之父——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曾姓“帕瑞曼”(Perelman),1858—1922]缺乏经验,而是由于语言使用者不愿放弃现有的文化,同时又对自己的母语充满怀念。如果没有来自复兴者母语的多重营养,一种已经不再被使用的语言是不可能复兴的。现在以色列语的语调更接近依地语的语调,而不是阿拉伯语或其他闪米特语的语调。因此必须承认,以色列语与古希伯来语截然不同。对于这种多源的以色列语,人们应该欣然接受,而不是责难。

### 三、希伯来语复兴的经验和教训

#### (一) 混合、隐蔽及重合原则

以色列语是一种新的混合语,而不是希伯来语的一个演变阶段。对以色列语而言,依地语不是一种“外国语”,这可从成千上万种所谓的外来词中择其一例来说明。以色列人的直觉都认为 intuítšya(直觉)并不是一个外来词(依地语的 intuítšye,俄语的 интуиция,波兰语的 intuicja等,都是“直觉”的意思),而是以色列语的组成部分。根据重合原则,如果语言的一个特征存在于越多的复兴者所说的语言中,那么它就越可能保留在新出现的语言中。这条原则削弱了历史语言学的语言谱系树理论(family tree theory),因为后者给人以“每种语言只有一个源语”的错误印象。例如,虽然大多数语言复兴者提倡复兴属于闪米特语的希伯来语,但他们所讲的语言(主要是依地语)中没有闪米特语的咽音 áyin(如 Zuckermann 的教名——事实上是犹太教名——Ghil ád)。结果大部分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语言中丢失了这个咽音。

同样地,一个普通的以色列语问候语 má nishmà(最近怎么样?)看上去就像一个依地语短语 vos hért zikh 的仿造。这个短语通常发音为 vsértsekh,意思是“听到什么了”,同样起常用问候语的作用。然而,也许一位罗马尼亚裔的以色列移民会受罗马尼亚语 ce se aude 的影响、一位波兰裔的犹太人会受到波兰语 co słychać 的影响、一位俄裔移民会受到俄语 Что слышно 的影响,而都说 má nishmà。所有这些说法意思都是一样的,起的作用也是相同的。由此可看出现代以色列语的多源特性。

形式与模式的区别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以色列语的多重来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语言捍卫团”(gdud meginéy hasafá)的格言是“希伯来人(即犹太人)讲希伯来语”(ivrí, dabér ivrít),他们拆毁用“外国语”写成的指示牌,扰乱依地语的演出剧场。然而,这个组织的成员们仅仅关注的是依地语的形式,而不是那些已经选择说“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言语中的模式。也就是说,语言捍卫者们不会攻击一位说 má nishmà 的以色列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语言捍卫团的团歌里甚至就包括了依地语的仿造。

诸葛漫发现了迄今被人们忽视的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隐蔽语义网络,分析了仿造(例如英语 superman 是德语 Übermensch 的仿造词语)、音位语义配对(例如,英语 crayfish 来源于古法语 crevice,是螃蟹的同类却与“鱼”无关)及合并词(例如, motel 是 motor + hotel 的合并词,

sprummer 是 spring + summer 的合并词) 等的机制。<sup>①</sup> 接下来需要揭示在目标语的单词中被隐藏起来的语义联系,而这种联系通常反映源语言的语义网络。请考虑一下以色列语的 gakhilít 一词(即 firefly 或 glow - worm,意为“萤火虫”),它是由桂冠诗人比利亚克(Hayyim Nahman Bialik 1873—1934)创造的。这个词在语义上和语源上都与圣经希伯来语中的 gahelet(意思是“燃烧的煤炭,发光的余火”)一词有联系。从形态学上说,以色列语的 gakhilít 源自希伯来语的 gahelet 加上它的第三个词根的重叠。然而,没有一本以色列语词典能够揭示其语义来源。换句话说, gakhilít 这个以色列语的混合词,事实上是欧洲人的思维模式的复制品,它使用了一个与“发光”有关的语义成分。这点在依地语的 glivórem(字面意思是“发光 gahelet + 蠕虫 worm”)或德语的 Glühwürmchen 一词中是显而易见的。

## (二) 设置合理目标,理性看待语言复兴

自以色列语孕育之初,就倡导纯语主义(和冰岛语一样,对外来词深恶痛绝<sup>②</sup>),力图贯彻“正确”的发音。由以色列教育部出资、成立于1953年的希伯来语科学院(以色列语为 haakademya lalashón haivrít)是研究希伯来语的最高学术机构,它取代了本-耶胡达及其同事们于1889年成立的(希伯来语)语言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根据其章程规定,希伯来语科学院具有三大职能:(1)收集编撰各时期的希伯来语词汇;(2)研究希伯来语的结构、历史及其支系语言;(3)根据希伯来语固有的语言特征,按照日常和学术上的需要,在词汇、语法、书写、拼写和转写(实际上是抄写)等方面给予指导。

第一个目标最具实用价值,因为以色列语确实是一个多层次的语言。例如,某个人既可以说 khashkhú enáv(字面意思是“他的眼睛变暗了”)来表达“他看到了黑暗”(“黑暗”在这个语境中意为“坏消息”),也可以说 niyá/naasá lo khóshekh baenáim。尽管二者结构不同,但意思相同。khashkhú enáv 是希伯来语,而 niyá lo khóshekh baenáim 是依地语短语 siz im gevórn fíntster in dí óygn 的仿造。反过来,此短语可能改编自希伯来语 khashkhú enáv(在这里用以色列语的形式写出,也许会令一位操古希伯来语的人感到费解)。

以色列语有许多其他的最小对立体,如 asá din leatsmó 和 lakákh et hakhók layadúim 都指一个违法的人,只是后者更口语化。再如, lelot kayamím——字面意思是“把夜晚当做白天”(也可说成 yamím kelelot,字面意思是“把白天当做夜晚”)和 misavív lashaón——字面意思是“日以继夜”,两者都常指努力工作。

与土耳其语类似,以色列语中许多所指有好几个能指,其中的一个纯粹来自希伯来语,其余则更多来自“外国语”。这些词汇包括许多国际事务术语,如 opozítsya,即英语的 opposition(希伯来语科学院认为这个词应为 negdá——希伯来语的 néged,即英语的 against)和 koalítsya,即英语的 coalition(希伯来语科学院认为这个词应为 yakhdá——希伯来语的 yahad,即英语的 together)。

而希伯来语科学院的第三个目标(根据希伯来语的语言特征来指导其发展)是自相矛盾的。<sup>③</sup>倘若一种语言的特征朝着某种特定方向演变[参见萨皮尔(Sapir)的“漂移”说——在这种语言变化的模式中,语言的结构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转移],为什么还要通过语言监督去指导它的演变呢?

① Ghil 'ad Zuckermann, *Language Contact and Lexical Enrichment in Israeli Hebrew*,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② Sapir, Yair and Ghil 'ad Zuckermann, “Icelandic: Phonosemantic Matching”, in Judith Rosenhouse and Rotem Kowner (eds.), *Globally Speaking: Motives for Adopting English Vocabulary in Other Languages*, Clevedon - Buffalo -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8, pp. 19 - 43, 296 - 325.

③ Ghil 'ad Zuckermann, “Realistic Prescriptivism: The Academy of the Hebrew Language, its Campaign of ‘Good Grammar’ and Lexpionage, and the Native Israeli Speakers”, *Israel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2008b (1), pp. 135 - 154.

#### 四、澳大利亚土著语的复兴之路

一般来说,语言复兴和语言生存有三条基本原则,具体如下:

第一,如果你的语言或方言已经濒危了,不要让它消亡!<sup>①</sup>

第二,如果你的语言或方言已经消亡了,停止它的消亡,复兴它,让它生存!

第三,如果你复兴了你的语言或方言,接纳复兴语的混合性!

语言复兴有时很隐蔽且令人困惑,但一直以来都是澳大利亚土著语言面临并急需解决的问题。人们能够认识到当前的语言复兴运动具有实用价值,但该行动却缺乏理论指导。尽管希伯来语复兴的实例已证明语言各成分的复兴成功率是不同的,但人们仍力图复兴语言的全部成分。因此,有必要检验一系列现有的语言复兴计划,以便评估各语言成分的复兴成功率,同时还要摸清所涉及的语言集团的偏好。

土著澳大利亚人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万余年。现今土著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2.6%。最新的一项国家土著语言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的语言状况不容乐观。在已知晓的250多种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仅有145种仍在使用。其中绝大多数(约100种)已严重濒危,其使用者大多已超过40岁;18种语言状况良好,被各年龄组的人使用,其中三四种已显露出逐步走向濒危的迹象。综合来看,在250多种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仅6%(5种)的语言仍处于健康状态。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复兴运动仍处于起步阶段,它需要从其他语言的复兴实践(特别是希伯来语的复兴)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散布在澳大利亚各地区的土著语言复兴活动之间鲜有协作,直到如今语言复兴工作者们才开始通过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交流各自的经验。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加大投入,来促成学界和实践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并配合各地区的土著语言中心以及设在阿德莱德大学的流动语言工作组的工作,为他们提供学术的和具有全球视野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急需完成的工作是出版一本关于澳大利亚语言复活最佳方式的指导手册,并努力增强当地土著群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 五、希伯来语和土著语言复兴的对比分析

在希伯来语复兴的初始阶段,倡导语言复兴的人很少,且他们常遭遇他人的敌意和憎恨,甚至有些人认为希伯来语的复兴是对一种神圣语言的亵渎。但与澳大利亚的语言复兴者相比,希伯来语的复兴仍有一些优势,具体如下:

第一,书面资料丰富。复活前,虽然希伯来语口语灭亡了,但其流传下来了大量希伯来语书面资料,如《希伯来语圣经》和《密西拿》等。

第二,可及性强。犹太人要在犹太教堂做礼拜或在就餐时做祷告。这些时候,犹太人就不自觉地接触到了希伯来语的书面语。

第三,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相比依地语,希伯来语被认为是一种享有声望的语言。在澳大利亚的社会语境中,土著英语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土著语言。尽管一些土著人珍视自己的语言,但这些土著语却不被整个澳大利亚社会所重视。

第四,处于语言选择的垄断地位。希伯来语是全世界的犹太人的共同语(阿拉姆语的地位并不像希伯来语那样突出)。澳洲有数十个“休眠”的土著语言,除土著英语外,很难挑选出一种语言

<sup>①</sup> 详见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8—12页;曹志耘《汉语方言:一体化还是多样性》,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1—6页。

能够作为全民的统一语。单种语言的复兴比起多种处于不同濒危阶段的语言复兴更容易操作。

第五,国家政治的需要。以色列语(复兴的希伯来语)力争成为设想中的“以色列”国的语言。在这个国家,操以色列语(复兴的希伯来语)的人将最终获得政治权利。

第六,希伯来语使用者持开明的语言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与土著语言的情况不同,<sup>①</sup>任何人不需要获得犹太人的许可便有权说希伯来语;不排斥借词和外来词,埃利泽·本-耶胡达就喜欢从阿拉伯语、阿拉姆语和其他闪米特语言中借用语言成分。

第七,长期多语制培养了语言使用者的多语思维模式。在希伯来语复兴时期到达以色列的犹太人都是多语者,没有“单种语言”的思维模式。例如,当他们回到欧洲时,许多人会在家里讲依地语、在市场上讲波兰语、在犹太教堂里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做祷告。

第八,使用人口数量多。犹太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数量。

相比希伯来语的复兴,土著语言复兴也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著语言的复兴是出于道义的需要。现代人已经认识到,为了达到历史的、人性的、社会的公正,尤其是为消除不公,土著语言理所应当被复兴。<sup>②</sup>这个信念可以为复兴的努力提供力量。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本地权力”,但是“本地语言的权力”又在何处呢?难道土地比语言和文化更重要吗?如果土地、语言 and 传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合体,那么为什么仅仅要求收回土地呢?

第二,语言复兴出于社会需求。复兴休眠的语言可以促进个人、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增强那些缺失传统和生活目标的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希伯来语的复兴有许多不太实际的目标,其中最不实际之处便是希望为全世界的犹太人构造一种统一的语言。如今犹太人居住在世界各地,掌握不同语言,很难找到一种被所有犹太人都接受的语言做复兴语言的基础。比如,若选德语作为统一语,则对说拉地诺语的西班牙裔犹太人不公平。澳大利亚的土著语却不存在这种情况。

第三,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土著语言复兴。尽管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大,但客观地说,澳大利亚政府是支持土著语言复兴和保护的。目前,澳大利亚政府至少为语言复兴者提供了一个公开申请资助的渠道。上世纪末的巴勒斯坦却并非如此。

第四,澳大利亚土著英语中包含了大量土著语言的特征,这有利于土著语言的复兴。澳大利亚的某些土著英语(例如,阿德莱德的 Nunga 英语)包含了各种几近濒危的土著语言的语言特征(如内涵意义、联想意义、声音和像双数这类概念的形态学特点等)。也许有人会说,以色列语也是如此。虽然现代以色列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仿效依地语的,但其语义仍保留了原始的希伯来语的语义。其原因在于依地语(一种具有罗曼语底层的日耳曼语)受到了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的深刻影响。例如,从13世纪开始,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一些依地语方言(如波兰依地语)就经历了斯拉夫语化。与依地语保持希伯来语的特征相比较,土著英语年轻得多,更可能保持土著语言的特征。

## 六、语言复兴的启示

语言复兴需要考虑语言的个体因素,比如、社群的特定环境、需求和愿望等,但不能否认,语言复兴存在一些普遍的制约条件。正如上文所讲,现代的以色列语是一种多层面、多来源语言,试图以纯语主义复兴希伯来语的实践是失败的。与希伯来语复兴初期类似,目前一些澳大利亚的利益

<sup>①</sup> 详见 Walsh Michael, “Language Ownership: A Key Issue for Native Title”, in John Henderson and David Nash (eds.), *Language and Native Title*, Canberra: Native Title Research Series, Aboriginal Studies Press, 2002, pp. 230-244.

<sup>②</sup> Thieberger, Nicholas. “Language Maintenance: Why Bother?”, *Multilingua -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1990(94), pp. 333-358.

团体坚持“不真实,毋宁死!”的观点。<sup>①</sup> 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他们所说的“死”发生在希望拯救的濒危土著语言上。

为什么应该鼓励语言复兴者和土著领导者持现实态度,而不刻意追求语言的纯正呢?这是因为纯语主义会导致不切实际的预期目标,进而挫败学习者学习新语言的意愿。如果一种已复兴的语言受到邻近语言或英语的影响,我们不应否定它。不能认为从邻近语言中借用词汇是给复兴的语言“蒙羞”。就语言复兴本身而言(即,复兴一种已经没有人把它当做母语的语言,如希伯来语),我们必须学会接受、支持和赞扬,而不是责难那些不可避免的新语言的混合性。

也许有人认为,土著语言和以色列语的使用环境差别甚大,前者无法从后者获得经验。这否认了人类语言特别是逆向语言转换的普遍特性和制约条件。语言现实存在于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对这两个极端熟视无睹的话,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基于对以色列语的评论分析,我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各种已复兴的土著语言的境况,如 Kaurna 语, Gumbaynggirr 语, Ngarrindjeri 语, Walmajarri 语和 Kamilaroi/Gamilaraay 语等。

有学者嘲笑各种复兴濒危语言的努力“这已不再是一种语言,就像音乐家们说‘andante’(意大利语,“行板”的意思)和‘fortissimo’(意大利语,强音的意思)时,不能认为他们说的是意大利语。这些仅仅是在一种特殊的语境下使用的外来词罢了。”<sup>②</sup> 克里斯特尔(Crystal)对 Kaurna 语的评价显得更为中立:

当然,复兴后的语言和原始语言并不相同。最明显的是,复兴语缺少它原先拥有的功能广度,丢失了大量原有词汇。但是,由于它继续在当今使用,它会发展新功能和新词汇,正如任何活着的语言那样,只要人们把它视为表明他们身份的标记并准备继续使用它,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它看作是一个有效的交际系统。<sup>③</sup>

在此我们大胆预测,复兴的任何土著语言最终都将成为澳大利亚英语、土著英语、克里奥尔语、其他土著语和目标土著语的混合语。语言复兴研究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土著语言复兴者更高效地开展工作,并使他们接受复兴后的混合语。

## 七、结 语

本文旨在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和范式——复兴语言学。复兴语言学着重探究在语言复活、更新和复兴过程中存在的普遍制约条件和工作机制。它从一种语言复兴的实践中吸取有益的、可供其他语言比较借鉴的经验以便能在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的语言复兴行动之间架起一座认识论的桥梁。

从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复兴运动中可以初步得到语言复兴的一般步骤和基本要领。首先要了解和评估迄今为止的语言复兴运动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以使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导新的语言复兴活动。其次,对要复兴的语言要有充分认识,了解要复兴的语言与当地正在使用的语言的异同。接下来就是为语言复兴设立切合实际的复兴目标。如果将语言复兴活动看作一个统一的连续体,那么根据需要复兴的语言的特征和对语言复兴的需要,语言复兴活动可具体分为收复(像 Kaurna 语)、更新(像 Ngarrindjeri 语)和复兴(像 Walmajarri 语)等。然后的工作就需要语言学家长期观察、

<sup>①</sup> 详见 Dorian 关于 Tiwi 语的论述: Dorian, Nancy C., “Purism vs. Compromise i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d Language Revival”, *Language in Society*, 1994(23), pp. 479-494.

<sup>②</sup> Dalby, Andrew, *Language in Danger: The Loss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the Threat to Our Fu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50.

<sup>③</sup> Crystal, David, *Language Death*,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2.

倾听、学习和描绘每个土著社群(包括已复兴语言的社群和待复兴语言的社群)的既定特征。

截至目前,有些语言的复兴比其他语言的复兴更为成功。通过调查大量的澳大利亚语言复兴案例并从希伯来语的复兴中吸取经验,可对语言复兴理论形成更深刻的认识,这将减少资源的浪费并取得更好的结果。如上所述,本文初步探讨了适合于所有言复兴实践的语言学上的制约条件。掌握了这些条件将有助于一般的濒危语言尤其是土著语言的复兴。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新兴的复兴语言学理论以及传统的普通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理论对语言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语言复兴者的努力程度直接关系到语言复兴的成败,但是毫无疑问政治因素也是决定语言复兴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语言复兴对促进被复兴的土著族群发展和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发展环境大有益处。以澳大利亚土著社群的语言复兴为例,语言复兴至少在以下方面有利于社会和人(尤其是土著社会和土著居民)的发展:

第一,使土著居民更容易融入社会。

第二,提高了土著居民的能力水平和自身素质。在语言复兴的初始阶段,多数土著居民只因对语言感兴趣而接受复兴语言培训。事实上,在培训过程中他们将学到大量的实用技能,诸如读写能力、使用计算机的能力、进行研究的能力以及在公开场合演讲的能力。这些能力对土著居民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大有益处。

第三,增进当地土著社群的幸福感和荣誉感。

第四,调和并减少对土著人的种族歧视。

第五,促进土著地区的开发,尤其是作为旅游地的开发,帮助土著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已有的语言复兴活动已经证明,语言复兴上的小投入可以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正因为如此,全体社会都应关注语言复兴运动。正如大提琴家马友友在2000年11月28日的白宫文化和外交大会上所说的“我们必须学习其他文化来理解、喜爱并保存我们共同的世界遗产”。

**Abstract** The revival of Hebrew is so far the most successful known reclamation of a sleeping tongue and is a language movement that has been in progress for more than 120 years. By comparison, language revival moveme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uch as Australia are in their infancy.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Revival Linguistics, a new linguistic discipline and paradigm. It provides comparative insights and mak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Hebrew revival accessible to Chinese linguists, language endangerment experts and potential revival activists. Needless to say, the first stage of any desire by professional linguists to assist in language reawakening must involve a long period of thoroughly observing, carefully listening to the people, learning, mapping and characterizing the specific indigenous or minority community. Only then can one inspire and assist. That sai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linguistic constraints applicable to all revival attempts. Mastering them would be useful to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general and to future linguistic revival in China in particular.

(徐佳, 讲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上海, 200083)

(责任编辑: 黄凌翊)